

第三章 《自由中國》的核心人物

第一節 《自由中國》的精神象徵——胡適

壹、胡適（1891-1962）生平

胡適，原名洪騏，字適之。世居安徽績溪。父親名傳，字守三，又字鐵花，清歲貢生。母親馮順弟。1891年12月17日，胡適誕生於上海大東門外，兩個月後，由於其父調往台灣任職，便與其母遷往川沙，一年後才和家人一同前往台灣。1895年胡適驟然失怙，在寡母督促下進私塾讀書。胡適的母親對他幼時的影響最大，在讀書和做人方面都有重大的啟發。

1904年胡適到了上海，先後入學於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三所新式學堂，並開始接觸西方知識文明，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嚴復譯文與梁啟超有關政論。除了吸收新知之外，他也嘗試著寫文章和編輯¹，以刊佈意見和評論社會。1910年，他通過庚款留學考試，結束了國內教育，為他人生的大轉捩點。

胡適於1910年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在美國留學的七年（1910-1917）是他一生思想和志業定型時期。1912年，胡適改入文學院，1914年2月取得學士學位。1915年9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並受業於實驗主義大師杜威（John Dewey）博士，在杜威的教導下，胡適學會了思考的方法，隨時考慮當前的問題，將一切學說和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並且處處兼顧思考的結果。1917年5月，胡

¹ 此時胡適加入一個競業學會，並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叫做《競業旬報》。《競業旬報》共出了三十八期。從二十四期起，由胡適編輯。胡適後來說：「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字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一個開路的工人。」（毛子水，1998：183）。

適通過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

1917年8月，胡適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1917年12月，胡適回績溪與江冬秀結婚。一年後，胡母病逝，胡適奔喪回家，自感「深恩未報」十分哀傷。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運動，為他一生中成績最著、影響最大的事業，早在1917年《新青年》²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即初試啼聲，1918年12月同陳獨秀等辦《每週評論》³雜誌，推動新文化運動，後因意見不合而分道揚鑣。

1928年胡適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同時他繼續研究與著作，並且也作文章批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1930年北大蔣夢麟校長聘請胡適擔任文學院長。1932年正值「九一八」和「一二八」日軍侵華之後，國難當頭，胡適乃與當時在北京的教授們，如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創辦《獨立評論》⁴週刊，暢談政治。

1937年中日談和希望破滅，結束了胡適在中年期所作引人注目的社會與知識改革的奮鬥。1938年，他代王正廷為駐美大使，這是他第一次為中華民國政府效命。1942年胡適離職，此後，他繼續留在美國，然而仍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聯繫，並在1945年出任北大校長。1946年後國內政局急轉直下，他逐漸地認同中華民國政府，並參加1946年的立憲會議，此後，國內政治局勢的不樂觀，又使胡適恢復其超然與冷靜的批評者角色。

1949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情勢驟變，以反共自由派人士著稱的胡適，無法見容於海峽兩岸，只好過著半放逐似的學者生涯，遠赴美國。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創刊，以胡適為發行人。1958年蔣介石欲進一步尋求美援，便邀請胡適返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² 《新青年》雜誌於1915年1月創刊，1922年7月停刊，最後一期為第9卷第6期。

³ 《每週評論》於1918年12月22日創刊，1919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37期。

⁴ 《獨立評論》於1932年5月22日創刊，1937年7月25日停刊，一共發行了244期。

長。1962年，七十二歲的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內主持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中，突然因心臟病病發猝逝。

簡而言之，胡適的一生，除了四年的駐美大使外，全都從事教育學術文化方面的工作。思想獨立與坦白直爽是胡適一生的特色，他曾獲庚子賠款獎學金，先後就學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受教於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為杜威優秀門人之一。胡適曾經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文學是他的娛樂，政治是他的義務（封德徐，2003：42）。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是一個中心人物。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整理國故」到「全盤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總結成果的人。就學術研究而言，胡適的影響及於中國哲學、史學、文學各個層面。他是現代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鬥士。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先驅之一，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貳、胡適與《自由中國》

1949年春天，大陸危急之秋，胡適奉命到美國去⁵。他曾經和朋友們談到辦一個刊物以振起輿論，並且定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由他負責寫一個簡單的宣言。在太平洋船上，胡適於4月14日寫成〈「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寄回國內給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人。隨後《自由中國》半月刊於1949年11月20日創刊，以胡適為名義上的發行人，並且每期刊登這四條宗旨⁶。

不過胡適與《自由中國》的關係相當特殊，從創刊號開始他就掛名發行人，但是不論名義上或實質上，胡適都不願居於領導地位，一

⁵ 封德徐指出：1949年4月，胡適奉國民黨委派赴美求援（封德徐，2003：176）。余英時亦指出：胡適是受政府的託付，到美國來爭取支援的（余英時，2004：115）。由此可知，在國共內戰之時，胡適奉中華民國政府之命，到美國尋求援助。

⁶ 《自由中國》的四條宗旨參見第二章第三節《自由中國》的創刊。

方面當然和他身在國外有關，另一方面，胡適於1949年4月赴美，11月《自由中國》創刊，此期間的籌辦經過，胡適並未實際參與。發刊後，雷震逕行以身居國外的胡適為發行人，胡適雖然草擬了宗旨，仍希望王世杰、雷震與崔書琴、張佛泉、毛子水等人再商量，但《自由中國》社中人士仍堅持胡適為發行人，雖然胡適最後勉強接受，但仍耿耿於懷，直到1953年2月才得以辭卸該職，此後，《自由中國》乃將發行人與主編改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⁷。不過，胡適仍一直是《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其實若沒有胡適這塊招牌，《自由中國》的起步勢必將更為艱辛，無論是「發行人」或「編輯」，胡適對於《自由中國》或雷震，都是一頂保護傘，故當刊物因為言論或雷震個人遭遇困難時，胡適往往是那位幫忙出面協調的人，因此，胡適對《自由中國》的功用至少有兩方面，一是作為精神領袖的導引作用，另一是作為「掩護作用」⁸。雖然胡適並未實際擔任《自由中國》的編輯事務，但是對《自由中國》同仁的精神領袖位置卻是不容置喙的權威。誠如胡適自己說的，他擔任《自由中國》不負責任的發行人的虛名，是歷史上的關係（胡適，1952：4），更是人心一致的推舉。

除了自由中國社同仁對胡適推崇⁹，在讀者方面亦以胡適為標的，余光中、何凡、孟瑤、林海音、陳諧庭、夏菁、郭嗣汾、琦君、彭歌等作家更聯名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因而《自由中國》也需要刊登胡適的文章，以表示胡適支持之意，胡適的名聲，更影響雜誌海外銷售宣傳（任育德，1999：88）。是以胡適在精神領導的作用，

⁷ 胡適辭掉發行人虛職之後的「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委員有毛子水、申思聰、杭立武、金承藝、胡適、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聶華苓、瞿荊洲、羅鴻詔等。但此一委員名單只掛出一期，次期又回復編委會名義。

⁸ 胡適指出：假如「發行人胡適」這五個字在創刊時為爭取言論自由有一點點掩護的作用，到現在也用不著了（胡適，1958：9）。

⁹ 殷海光即大力推崇胡適是中國近五十年來思想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殷海光，1959b：10）。

確認自由與人權為不可或缺，肯定自由與人權為反共之根本動力，胡適在傳承和未來方針的指導，對知識份子的影響力非常重要（徐筱薇，2004：33）。

胡適之所以大力支持《自由中國》，除了它是一份提倡自由民主的刊物，而他本人又是早期催生者之一外，國內朋友的關照、擔保，應是一因。因而胡適為了雷震，為了《自由中國》，以及為了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和政府當局有過許多次據理力爭。1951年6月《自由中國》因為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起政治風波，胡適便首先發難抗議：「《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因此他寫信給雷震，要求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萬麗鵬，2001：24）。

此外，《自由中國》因為言論一再觸犯禁忌，政府有關部門威迫印刷廠拒絕承印，雷震到處奔走交涉，胡適也親自要求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負責解決。1956年10月蔣介石謙辭祝壽，要求大家提示問題，發表意見，胡適為《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寫了一篇〈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建議蔣介石以無智「御眾智」，以無能無為「乘眾勢」，自己絕對節制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也不輕易做一件壞事，這樣才是守法守憲的總統。

1959年3月《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一文之後，有許多爭議出現，質疑胡適為何突然變更他爭取自由的態度；旋即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7期（1959年4月1日），毛子水和殷海光分別發表文章替胡適申明與解釋¹⁰。1958至1959年間，出版

¹⁰ 毛子水在〈「容忍與自由」書後〉申明胡適的爭取態度不會因提倡容忍而罷休（毛子水，1959：14）。殷海光在〈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則進一步指出胡適所說的容忍態度，是解決中國問

法的修正和總統三連任的問題，先後引起海內外的反對抗議，胡適基於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立場，也公開發表反對的談話，措辭明白而堅決。胡適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如表 3-1 所示。1960 年雷震被捕，大家責怪胡適未盡力營救，其實他面見總統，當面抗議軍法局審判草率倉促，要求國防部的覆判有以補救。等到國防部覆判維持原判，他又邀集學術界和社會清望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張忠棟，1990：10），但雷震仍被判處十年徒刑，胡適的挫折不言可喻。

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方面，雖然外界期望或要求胡適在政治和文化活動上引領眾人，胡適個人的意願卻相當有限。以雷震來說，他十分敬重胡適，並在信中頻頻向胡適邀稿，希望能借胡適之名強固《自由中國》的地位與政論報國的可能。他也多次敦促胡適出來主持和領導反對黨運動（楊貞德，2002：411-412），但胡適對於組織反對黨並無興趣，並表示「從來沒有夢想到自己出來組織任何政黨」，「絕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領導一個政黨」，胡適以年長、自知非領導人才為由婉拒。但誠如張忠棟指出：胡適年齡已長，健康不佳；學術界裡的人希望他多領導學術的正業，少管政治上的閒事；胡適和官方的關係也是他的一層負擔，使他不便和權威正面翻臉，也可能使他一廂情願的相信若干官方關係的維持，可以有助於朝野衝突的化解（張忠棟，1990：9），諸多因素均使他一再婉拒出任新黨領導。

綜上所述，胡適因為身體健康，雖不能大量寫作，但多次寫稿交付《自由中國》；回台灣也接受《自由中國》舉辦的座談邀請；他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職務後，也未曾中斷與雷震的聯繫與關心《自由中國》所面臨的諸風波。故胡適直到《自由中國》停刊止，始終與《自由中國》連在一起，成為《自由中國》的精神象徵（任育德，1999：

題在心理狀態方面的基本鑰匙，〈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目前中國的動亂怎麼解決之一個總的啓示（殷海光，1959a：16）。

89)，更是《自由中國》人士心中的精神領袖。

表 3-1 胡適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 日期 | 卷期 | 篇 名 |
|--------------|------|------------------------|
| 1949. 11. 20 | 1:1 | 〈「自由中國」的宗旨〉 |
| 1949. 11. 20 | 1:1 |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
| 1951. 09. 01 | 5:5 | 〈致本社的一封信〉 |
| 1951. 09. 01 | 5:5 | 〈十年來中美關係急趨惡化的原委〉 |
| 1952. 12. 16 | 7:12 | 〈「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 |
| 1952. 12. 16 | 7:12 | 〈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 |
| 1953. 01. 01 | 8:1 | 〈東亞的命運〉 |
| 1953. 02. 01 | 8:3 | 〈三百年來世界文化的趨勢與中國應採取的方向〉 |
| 1954. 03. 16 | 10:6 | 〈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
| 1954. 04. 01 | 10:7 |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
| 1955. 04. 01 | 12:7 |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
| 1956. 10. 31 | 15:9 | 〈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
| 1959. 03. 16 | 20:6 | 〈容忍與自由〉 |
| 1959. 04. 01 | 20:7 | 〈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二節 《自由中國》的火車頭——雷震

壹、雷震（1897-1979）生平

雷震，原名雷用龍，學名雷淵，赴日留學後始更名雷震，字傲寰。1897年6月25日生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溪口鎮。父雷天壽，母陳氏浙江人。雷震於十二歲前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十二歲以後則為新式教育。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1916年雷震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三中學，1916年10月赴日留學。1917年5月7日在戴季陶與張繼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¹¹。1923年雷震自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系。1926年畢業，入該校研究所研究憲法，只攻讀一學期，即於冬季返國。

雷震返國後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長、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震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過程。1949年雷震至上海擔任京滬警備司令部政委，與谷正綱、方治協助湯恩伯防衛上海，三人獲得「三劍客」之稱。上海撤退後，經廣州至台灣。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胡適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售量最廣的政論雜誌。1950年雷震獲聘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此時雷震得意於政壇，且與蔣介石關係和諧親近。

1951年雷震與洪蘭友共赴香港，代表政府宣慰反共人士，並探聽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情形。回台之後於改造會提出港澳之行報告，報告內容提及在港之反共人士要求當局廢除學校三民主義課程以及軍隊國家化，引起執政當局不快¹²，從此雷震與蔣介石漸行漸遠。

1953年2月，胡適由於人在國外，堅請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此後一切雜誌都由雷震負責，而雷震本人也全心投入。由於《自由中國》言論特殊，他成為胡適讚譽中所謂「在台灣努力爭取言論自由的

¹¹有關雷震入黨記載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10冊），台北：桂冠，頁413-414。

¹²針對此事，蔣經國在忠烈祠公祭時，當面斥責雷震乃受共黨唆使，才建議廢除軍隊黨部（傅正主編，1989-1990（33）：70）。蔣介石在軍隊黨部改造會就職會上亦指責雷震與洪蘭友在改造會上的建議與匪諜、漢奸無異（傅正主編，1989-1990（33）：81）。

朋友中最有功勞的人」，他成為許多服膺民主自由痛惡極權奴役者心目中的「民主鬥士」；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了當時官方心目中不受歡迎的人物（風雲論壇編委會，1987：122）。

1954年12月，雷震因為在《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被註銷國民黨籍。1955年1月，美國國務院邀請雷震訪美並為眼病赴美就醫，但未獲准出國，胡適願意作保亦無法挽回。1956年10月《自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更引發黨、政、軍刊物的圍攻。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刊載一系列社論「今日的問題」，全面討論國事。此後雷震除關切保障人權、改革地方政治等議題外，更用心於促進反對黨成立，與大陸籍政治精英、台灣籍地方精英均保持密切聯繫。

1960年雷震發起「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奔走各地召開組黨說明會，以實際行動貫徹其政治理念。同年9月4日執政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雷震於獄中撰寫回憶錄，批評執政當局，回憶錄於刑滿出獄前遭扣留。

1970年9月4日雷震刑期屆滿出獄。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雷震憂心國事，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¹³。1978年雷震因腦瘤至榮總開刀，此時身體已十分虛弱。1979年3月7日，病逝榮總，享年83歲，火化安葬於南港自由墓園。墓碑自題：「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之墓」。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起了精

¹³ 〈救亡圖存獻議〉是雷震呈現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藍圖，與憂國憂時的結晶。同時，也顯示他終生對民主制衡理念的堅持，與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任育德，1999：314）。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身兼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陷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對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先啟後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滿波折，可謂生不逢時，早年奔波於戰禍，晚年為理想入獄，他有生之年飽受橫逆與困頓，但無疑的，他是一位道德崇高的知識份子，一位愛國之士，一位願意為理想犧牲的自由主義者。雖然他曾經歷了十年牢獄的苦難，但他的剛毅精神，卻在今日留下永恆的典型。

貳、雷震與《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參與《自由中國》創辦者之一的雷震，本身是國民黨員，在大陸時期曾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的秘書長，周旋於各黨各派人物之間，來台之後，仍高居總統府的國策顧問，乃是充分受到蔣介石信賴的國民黨要角，同時也與當時在野政黨領袖維持良好友善的關係，故《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執政當局基本上相安無事。當時《自由中國》的發行人是胡適，而實際負責人是雷震，自第8卷第3期（1953年2月1日）起改由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擔任發行人，其後台灣省新聞處函示需刊發行人姓名，又從第20卷第5期（1959年3月1日）起，發行人由編輯委員會換為雷震，直到最後一期為止。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第4卷第11期）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誌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雷

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刊一篇社論加以平衡，《自由中國》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第4卷第12期）為題又刊載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表達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為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載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與執政當局的關係開始連鎖演變，一發不可收拾。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衝突。當年在台灣，執政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12月一篇名為〈搶救教育危機〉（第11卷第12期）的讀者投書，針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此舉令執政當局勃然大怒，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註銷雷震的黨籍，雷震與執政當局終於分道揚鑣。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1956年10月，《自由中國》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的十六篇文章組成的「祝壽專號」（第15卷第9期），對蔣介石與執政黨提出建言，社論〈壽總統蔣公〉中建議選拔繼任人選、確立國家內閣體制與實行軍隊國家化；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建議蔣介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期盼蔣介石將政權開放；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人格心理來分析蔣介石的性格；雷震〈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強調軍隊應超出黨派。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漓，連鎖九版，一時洛陽紙貴，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造成政界與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執政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從1957年8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推出「今日的問題」¹⁴（第17卷第3期至第18卷第4期）十五篇社論系列，針對短期內反攻大陸問題、軍隊軍備消耗國家經費、經濟財政問題、美援運用問題、中央地方權限問題、新聞自由問題、救國團問題、教育問題與反對黨問題等提出反省，全面檢討了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各方面的問題與癥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份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準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執政當局。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驩、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雷震案爆發後，胡適兩度在美打電報給陳誠副總統，主張司法審判；張君勱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雷震；雷震長女雷德全在《紐約時報》發表多篇投書，為父抗議；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發表聲明，願為所寫社論負起法律責任。但是這些舉動仍無濟於事。由於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因而停止發刊。《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十年九個月又十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十年，正好橫跨1950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十年。

¹⁴ 「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總共刊出15篇文章，依次為：〈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反攻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反對黨問題〉。

雷震在《自由中國》扮演重要角色。身兼社長、代理發行人、編輯委員會的召集人、作者之一、向外邀稿、爭取經費、校對者之一，多重角色的扮演，使他成為社務運作不可缺少的人物。當時與雷震共事於《自由中國》的夏道平、傅正、馬之驩等人，日後為文追溯往事，不僅強調雷震與《自由中國》關係密切，且多給予正面的評價。夏道平在《我在《自由中國》》一書的序言中，曾把胡適比作一把「保護傘」，把雷震比作一輛「火車頭」，意謂著雷震衝勁十足（夏道平，1989：5）。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19冊），《雷震與政治反攻》（一）有言：「離開雷先生就無法瞭解《自由中國》，離開《自由中國》也同樣無法瞭解雷先生（傅正主編，1989-1990（19）：6）。」馬之驩在《雷震與蔣介石》一書中認為：「《自由中國》之所以有這麼長的壽命，雷震雖不能居全功，但也該居首功（馬之驩，1993：145）。」

雷震是實際帶動《自由中國》的火車頭，《自由中國》半月刊從創辦開始到被迫停刊為止，都是由他掌舵，《自由中國》的論述內容和言論方向是他在主導，其後也因為他與國民黨權力關係的改變而產生相應的變化。雷震由國民黨員成為非國民黨員，由接近權力核心而遠離權力核心，雷震政治生活中參政者的角色重要性逐漸減弱。這種轉折也顯示他與威權化的統治當局的衝突（任育德，1999：93）。但雷震依然以議政者角色呼籲政府實行自由民主，他主持的《自由中國》因此成為台灣言論自由的指標¹⁵。

¹⁵ 朱文伯、魏誠亦持類似看法（朱文伯，1985：281）、（魏誠，1984：22）。

表 3-2 雷震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 日期 | 卷期 | 篇名 |
|------------|-------|-----------------------|
| 1950.02.16 | 2:4 | 〈以暴易暴乎？〉 |
| 1950.04.01 | 2:7 | 〈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 |
| 1950.08.01 | 3:3 | 〈為國民黨改造進一言〉 |
| 1951.07.01 | 5:1 | 〈我們的立場〉 |
| 1951.10.01 | 5:7 | 〈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
| 1951.11.16 | 5:10 |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
| 1951.12.16 | 5:12 | 〈民主政治就是輿論政治〉 |
| 1952.10.01 | 7:7 | 〈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 |
| 1956.10.31 | 15:9 | 〈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
| 1957.07.01 | 17:1 | 〈今日的司法！〉 |
| 1957.12.01 | 17:11 | 〈「今日的問題」(十)：今天的立法院〉 |
| 1958.02.16 | 18:4 | 〈「今日的問題」(十五)：反對黨問題〉 |
| 1960.05.16 | 22:10 |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三節 《自由中國》的台柱——殷海光

壹、殷海光（1919-1969）生平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殷海光是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採用的筆名，1919年12月5日誕生於湖北黃岡回龍鎮的一個傳教士家庭。1930年隨伯父殷子衡到武昌讀書。初中時代，殷海光不是獨佔鰲頭的好學生，桀驁不馴，個性倔強，喜歡的課程成績好，不喜歡的往往不及格。1932年伯父和父親認為他不堪造就，便強迫他在二年級中輟，送到漢口一家食品店當學徒。翌年，因生活格格不入，不辭而別，又重回武

昌讀書。

1936年夏天高中畢業。寫信給仰慕的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¹⁶，表明欲到北京求學，之後寄宿金岳霖家，並與哲學界人物熊十力、張東蓀、沈有鼎等人接觸，眼界大開。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對「左派」反感，常與人辯論。1938年秋天，入西南聯大哲學系，期間常與「左派」學生辯論，1942年考入清大哲學所當研究生，1944年肄業。1945年殷海光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但因為不適應軍隊生活回到了重慶。1946年殷海光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並擔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學與邏輯」課程。

1949年3月，隨《中央日報》來台，仍擔任主筆，並兼《民族報》總主筆。8月，離開報界，到台大哲學系擔任講師，先後教授「邏輯」、「羅素哲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等課程。11月，任《自由中國》編輯，並於創刊號發表〈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第1卷第1期）一文，此後活躍於《自由中國》，發表許多文章皆膾炙人口。

1954年，殷海光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哈佛大學研究講學一年。一年後殷海光回到台灣，一方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為《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之一。1957年殷海光升為台大哲學系教授。1958年12月，在台大公開演講〈胡適與國運〉。此後，台大不准社團再請殷海光演講。

1960年9月，發表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第23卷第5期），支持雷震等人發起的組黨活動。雷震等四人被逮捕後，與夏道平、宋文明三人一起撰文〈《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表示願意為

¹⁶ 在高二那一年殷海光寫信給《邏輯》一書的作者，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金岳霖，並獲得金教授的指導與鼓勵，這是他們師生關係的開始，這件事影響了他的一生（殷海光，1978：179）。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所寫文字負全部責任。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之後殷海光就不斷受到當局的壓力。

1962年2月，殷海光的學生李敖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與胡秋原等展開中西文化論戰。胡秋原認為是殷海光在背後策動，成為被攻擊的箭靶。殷海光被指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甚至於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1964年執政當局停止殷海光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的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1966年7月，殷海光家宅開始受到監視。1967年4月，殷海光不幸罹患胃癌，隨即赴台大醫院手術。5月，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執政當局不允許其出境，故未能成行。不久，海耶克教授來台灣訪問，執政當局也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該年7月台大由於受到當局壓力，不再續聘殷海光，失去教職後，生活更加困頓。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病逝於台大醫院。

綜觀殷海光的一生，雖然政治理想屢遭挫折，但在職業方面，殷海光在台大哲學系十七年（1949-1966）的教學生涯，極為風光。正因為殷海光太受歡迎，影響台大哲學系一代的學風極深。不少崇拜他的學生視他為思想導師，拾取他的牙慧自炫¹⁷。不僅如此，由於台大是全島第一學府，殷海光在台大如此有名，他的著作也就成為許多學人的研究材料，對知識青年有極大的影響力。

1950年代的台灣，殷海光是自由派知識份子中鋒頭最健者。他一生志業就是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當時他在台大哲學系授課，痛快批判舊中國傳統的不合理，鞭辟入裡；又在《自由中國》寫社論和

¹⁷ 據陳鼓應回憶，台大有些學生只懂得邏輯經驗論的一點皮毛，便動不動說：「你這句話是情緒語言，沒有意義！」（陳鼓應，1990：150）。

批評時政的專文，被當時台灣年輕一代文、法學生視為偶像。殷海光的文章分析力強，行文總是散播自由主義思想，持續地扮演了先進的啟蒙者角色，這使他成為四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游常山，1998：147）。

殷海光是二十世紀中國卓越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政論家，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台灣傑出的民主鬥士和啟蒙大師。作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領航人，殷海光的思想可以說為台灣民主化奠定了思想基礎。殷海光自詡為「五四之子」，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殷海光作為自由民主理論家，在台灣不遺餘力地傳播、鼓吹和宣揚自由民主觀念，李敖稱他為「偉大的先知」，他高舉抗爭旗幟，成為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啟蒙者，其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貳、殷海光與《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的作家群裡，殷海光無疑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他好惡分明，說話「語不驚人死不休」，吸收了「五四」許多觀念，畢生以自由主義者自許，在民主與反共的道路上一路披荊斬棘（林惠萱，2004：26）。他是黨外政論的先驅，也是《自由中國》的台柱，他以一枝生龍活虎的利筆，為台灣政論界綻放了引人矚目的異采，影響力前後長達二十年以上。

殷海光作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是由金承藝介紹進去的。殷海光以他的獨特個性和與眾不同的交往方式，一開始給雜誌社人員留下的印象是「不合群」，目中無人。當時《自由中國》雜誌社經理馬之驩回憶道：「後來大家都覺得『殷海光不合群』，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每天見面時他都繃著臉，一本正經，顯得很嚴肅，有點傲不可攀

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個性倔強』的人（馬之驩，1993：151）。」夏道平也回憶說，當初，他與殷海光也有一種不和諧的感覺（夏道平，1990：240）。在《自由中國》創刊以後的頭七年，特別是1949至1953年間，殷海光在社中，實是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他與社中朋友初期雖然互有不滿，但他畢竟願意留在社中；慢慢地，其他同事開始瞭解他的為人也有可親的一面，關係日趨好轉。

殷海光成為《自由中國》的台柱，是自1957年起的事情。從《自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後，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撰寫社論的數目，開始大幅度飆昇。他反極權和反傳統的思想，成為代表《自由中國》的旗幟。他的立言方向大多純從理論方面著手，涵蓋面較專題的時事評論為大，也較能夠顯示敵我雙方對立的思想立場。再加上，他的文章生動俏皮，筆鋒凌厲，持論尖銳，光芒四射，又有充足的西洋術語潤飾，極具吸收力和震撼力，也極易引起爭論；既令《自由中國》的聲譽蒸蒸日上，也為《自由中國》招來了不少敵人¹⁸。《自由中國》作為一本反權威的刊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的確少他不得（黎漢基，2000：25）。

查閱殷海光的論著，自從1949年11月20日他在《自由中國》創刊號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第1卷第1期）開始，到1960年9月，他在《自由中國》發表最後一篇文章〈大江東流擋不住！〉（第23卷第5期）為止，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文字顯然是大量的。包括：〈自由主義底蘊涵〉（第3卷第3期）（第3卷第4期）、〈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第5卷第4期）、〈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第5卷第7期）、〈獨裁怕自由〉（第10卷第7期）、〈重

¹⁸ 夏道平指出：在《自由中國》生命史的十年當中，他寫的稿子（包括社論、專論、公開信、翻譯），就篇數講，或許比我寫的少些。但在質的方面，比我的那些低調不知要高明響亮多少倍。他的文章，在分析事理方面充分顯出科學家的嚴謹精神，而在措詞造句上，又顯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人氣派。當時《自由中國》的聲譽蒸蒸日上，我們可以說，得力於殷先生的文章者為最多；同時為《自由中國》惹來麻煩的，殷先生的文章也真不少（夏道平，1990：242）。

整五四精神〉(第16卷第9期)、〈是什麼，就說什麼〉(第17卷第3期)、〈反攻大陸問題〉(第17卷第3期)、〈我們的教育〉(第18卷第2期)、〈創設講理俱樂部〉(第19卷第2期)、〈胡適與國運〉(第20卷第9期)、〈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第23卷第2期)等。殷海光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如表3-3所示。由此可見，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健筆，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專制的對抗中，他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此時的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舞台上發光發熱，可說是思想最菁華的時期。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他談〈反攻大陸問題〉，談反對黨，寫下了〈大江東流擋不住〉這篇震撼人心的社論，強調組織新黨的合理性，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實現。自命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此時發出了他在政治思想與實踐上的光熱和力量。

1960年9月4日，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的「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夏道平、宋文明聯名，發表了〈《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1960年10月1日在《聯合報》登載，為《自由中國》的言論辯護，並勇敢地對他們自己所撰寫的文字承擔負責，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顯了他的嶙峋風骨與道德勇氣。結果，雷震仍然身陷囹圄，《自由中國》封館，殷海光的論政生涯亦告終結。

雷震案發生後，殷海光受到極大的刺激，這時他的處境，正像李白詩中所說的：「拔劍四顧心茫然」，其內心的痛苦，可以想像（傅樂成，1990：99）。《自由中國》停刊之後，殷海光喪失了發言的舞台，

雖然逃過一劫沒有下獄，但他在台大的演講活動已屢受干擾；其後更因在中西文化論戰中被指為「西化論」的「黑後台」，而失去任教多年的台大教職。一生仗義直言的殷海光，晚年甚至落得飯碗不保，最後不敵胃癌的侵襲，於1969年溘然長逝（林惠萱，2004：27）。他所散發的銳氣與光彩，在動盪的時代裡，與他獨特的行止互相輝映著。

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殷海光勇敢直言，呼喚自由民主和理性，同專制極權對決，激發和影響了整個台灣的社會和大眾。《自由中國》因殷海光的雄文和勇氣而輝煌，殷海光也因《自由中國》而聲名大震（王中江，1997：95）。殷海光的文字清新而犀利，虎虎有生氣，充滿了積鬱的熱情與理想的色彩，在沉悶的時局中顯現一種懾人的力量，與當時八股與教條充斥、諂諛與阿附盛行的言論氛圍相形之下，尤其具有眾濁獨清的特色。他的文字魅力，確有不同凡響之處，在俗濫矯揉的當年台灣政論界中，佔有不容搖撼的突出地位，絕非偶然（風雲論壇編委會，1987：68-69），他所象徵的精神，迄今仍撼動人心。

表 3-3 殷海光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 日期 | 卷期 | 篇 名 |
|------------|------|----------------------------|
| 1949.11.20 | 1:1 |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 |
| 1950.08.01 | 3:3 | 〈自由主義底蘊涵(上)〉 |
| 1950.08.16 | 3:4 | 〈自由主義底蘊涵(下)〉 |
| 1951.08.16 | 5:4 | 〈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 |
| 1951.09.01 | 5:5 | 〈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 |
| 1951.10.01 | 5:7 | 〈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
| 1953.06.16 | 8:12 | 〈治亂底關鍵〉 |
| 1954.01.16 | 10:2 | 〈政治組織與個人自由〉 |
| 1954.01.01 | 10:7 | 〈獨裁怕自由〉 |
| 1956.03.01 | 14:5 | 〈個人為國家之本〉 |
| 1956.04.01 | 14:7 | 〈守護我們的保壘(上)〉 |
| 1956.04.16 | 14:8 | 〈守護我們的保壘(下)〉 |
| 1957.05.01 | 16:9 | 〈重整五四精神〉 |
| 1957.08.01 | 17:3 | 〈「今日的問題」(一):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 |
| 1957.08.01 | 17:3 | 〈「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 |
| 1958.01.16 | 18:2 | 〈「今日的問題」(十三):我們的教育〉 |
| 1958.02.01 | 18:3 | 〈「今日的問題」(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 |
| 1958.07.16 | 19:2 | 〈創設講理俱樂部〉 |
| 1959.05.01 | 20:9 | 〈胡適與國運〉 |
| 1960.07.16 | 23:2 | 〈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
| 1960.09.01 | 23:5 | 〈大江東流擋不住!〉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四節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比較分析

壹、《自由中國》的編撰者

《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都是大陸籍的知識分子菁英，或曾參與新文化運動者，或為接受其影響的年輕一代，或為民國以來自由主義參與論政者，均以自由民主為共同信念¹⁹。《自由中國》不僅在人物組成，同時在理念上也與新文化運動相關。故《自由中國》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台灣重新集結之重鎮。如魏誠即認為《自由中國》，「以思想史的角度，這是五四時代培育出來的自由主義者，流散到台灣的最後一個據點（魏誠，1984：1-2）。」編輯委員的組成，與其立論，吸引以知識分子為主的讀者²⁰（任育德，1999：85-86）。

《自由中國》創刊初期，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俱為大陸來台學養豐富人士。有國民黨黨員，如雷震；也有學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張佛泉；有血氣方剛的理想者，如殷海光；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國民黨官員，如教育部長杭立武、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洲。《自由中國》創刊之初的人事組織，對一份半月刊而言，確實可觀，在當時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馬之驢，1993：103）。尤其難得的是，撰稿實力強勁，堪稱一時之選。

除前述編輯委員之外，創刊以來，包括傅斯年、王世杰、蔣勻田、陳啟天、張其昀、王雲五、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羅家倫、陳紀澄、

¹⁹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號召力已眾所周知。毛子水是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參與五四運動，係《新潮》編輯群之一。胡適與張佛泉曾長期在《獨立評論》撰稿。殷海光更自認是「五四後期人物」。王聿修、張佛泉並曾領導北平學生反共運動。黃中回憶，他與殷海光、許冠三、李中直、申思聰、金承藝、聶華苓等人經王聿修介紹而參與《自由中國》（黃中，1996：11）。聶華苓回憶，她在李中直介紹下進入《自由中國》，擔任文藝編輯（傅正主編，1989-1990（2）：307）。馬之驢則是王聿修在華北大學的學生，經王介紹參與《自由中國》（馬之驢，1993：86-87）。

²⁰ 雜誌的定位曾有數次討論，最後仍設定以知識份子為讀者，因知識份子關心政治，且他們方可瞭解反共與自由民主之理念之重要性（傅正主編，1989-1990（34）：183、187、192）、（傅正主編，1989-1990（35）：140、142）。

吳廷以、錢穆、胡秋原、吳相湘、薩孟武、吳康、鄒文海等作者（李鴻禧，1992：3）；嗣後加入一批生力軍，如徐道鄰、徐復觀、陶百川、朱文伯、丘漢平、陳之藩、羅孟浩、程滄波、劉慶瑞、李聲庭、沈雲龍、傅正、宋文明等人（李鴻禧，1992：8）。其中不少中途脫離編輯陣容。後期社論，經濟方面由夏道平、戴杜衡撰寫，外交方面宋文明，思想方面殷海光，政治方面主要為傅正。編者與撰者或專精國學、史學，或擅長法、政、財、經等社會學科的理論新知，秉持著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良知及自我期許，抒發所見，啟迪後學後進，無論當時或日後，普受尊重與肯定，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毛知礪，1996：125）。

貳、《自由中國》的重要編輯委員

李筱峰分析《自由中國》雜誌編輯群呈現幾點特色：包括學者或大學教授出身之高級知識份子的組合；延續五四運動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啟蒙；主要份子出任政治要職；全部來自中國大陸，沒有一位是台籍人士（李筱峰，1992：187）。馬之驢認為，《自由中國》的初期編輯委員，可分成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唯我主義」的思路（馬之驢，2002：93）。他特別說明持第三種路線者，原本為國民黨少壯派的極右派，其思想邏輯是「二分法」的，換言之，他們認為蔣介石以降的黨政大員均應為大陸淪陷負全責。而這也說明了《自由中國》中有思想矛盾²¹。

初期的執行編輯黃中回憶：「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內部人事來說，其成員原便是老、中、青三代的結合，代溝與意見的爭辯是在所不免的（黃中，1996：11）。」年輕的編輯委員諸如殷海光、李中直、

²¹ 馬之驢指出自由主義學者王聿修是第一個辭職者，表面上的理由是到香港主編《前途》雜誌，實際的理由是對於雷震忘了編輯職權與制度的問題而引發王的不悅。馬之驢特別強調雷震對於《自由中國》雜誌的無私心及投入（馬之驢，2002：94）。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許冠三、黃中等人，初期雷震總是勸他們「和為貴、忍為安」，許冠三也回憶：「若干批評政府的文稿，不是給改成溫吞水，就是整篇見不了天。當爭到無詞以對時，他總是夥同毛子水勸我們年輕人莫動火氣，須以大局為重（傅正主編：1989-1990（2）：252）。」聶華苓亦回憶編輯委員會開會情景：「編輯委員會上，毛子水先生平和、克制，殷海光潑辣鋒利。戴杜衡和夏道平明智冷靜，常在他們之間調和平衡（聶華苓，1996：E7）。」由上述可知，雷震與毛子水、夏道平、戴杜衡、羅鴻詔等幾位編輯委員較為接近，而毛子水平和，殷海光鋒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穩健。

茲就《自由中國》較為重要的編輯委員，胡適、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毛子水、戴杜衡等，分別就其生卒年、籍貫、學歷、重要經歷、重要言論加以比較分析，如表 3-1：

表 3-4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資料表

| 人物 | 生卒年 | 籍貫 | 學歷 | 重要經歷 | 重要著作 |
|-----|-------------------|----------|-----------------|-------------------------------|---|
| 胡適 | 1891 1962 | 安徽 績溪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 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 | 〈「自由中國」的宗旨〉(1:1) 〈致本社的一封信〉(5:5)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12:7) 〈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15:9) 〈容忍與自由〉(20:6) |
| 雷震 | 1897 1979 | 浙江 長興 |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研究所肄業 | 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監察委員、制憲國大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 | 〈以暴易暴乎?〉(2:4) 〈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2:7)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5:10) 〈民主政治就是輿論政治〉(5:12) 〈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7:7) 〈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15:9) 〈今日的司法!〉(17:1) 〈「今日的問題」(十):今天的立法院〉(17:11) 〈「今日的問題」(十五):反對黨問題〉(18:4)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22:10) |
| 殷海光 | 1919 1969 | 湖北 黃岡 |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肄業 | 中央日報主筆、民族晚報總主筆、任教台灣大學哲學系 |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1:1) 〈自由主義底蘊涵〉(3:3) 〈3:4〉 〈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5:4) 〈獨裁怕自由〉(10:7) 〈重整五四精神〉(16:9) 〈「今日的問題」(一):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17:3) 〈「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17:3) 〈「今日的問題」(十三):我們的教育〉(18:2) 〈創設講理俱樂部〉(19:2) 〈胡適與國運〉(20:9) 〈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23:2) 〈大江東流擋不住!〉(23:5) |

表 3-4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資料表（續）

| 人物 | 生卒年 | 籍貫 | 學歷 | 重要經歷 | 重要著作 |
|-----|-------------------|----------|--------------|------------------------------------|--|
| 夏道平 | 1907 1995 | 湖北 大冶 | 國立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畢業 | 任教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商專、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4:11) 〈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題〉(13:6) 〈「今日的問題」(三):我們的軍事〉(17:4) 〈「今日的問題」(七):小地盤、大機構〉(17:8) 〈我們反對軍隊黨化〉(20:6) 〈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20:12) 〈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21:2) 〈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22:7) |
| 毛子水 | 1893 1988 | 浙江 江山 | 德國柏林大學理研究所肄業 | 任教北京大學史學系、西南聯大史學系、台灣大學中文系 | 〈歷史的教訓和英國的國策〉(3:12) 〈日本人民目前的平正大道〉(4:3) 〈日本的和約問題和加入聯合國問題〉(4:5) 〈常識與政治〉(4:10) 〈寬容和民主〉(4:12) 〈試談文化的建設和反共理論以壽蔣總統〉(15:9) 〈「容忍與自由」書後〉(20:7) 〈「自由中國」十週年感言〉(21:10) |
| 戴杜衡 | 1907 1964 | 浙江 杭州 | 上海復旦大學法科畢業 | 新生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大華晚報、民主評論、中央日報主筆 | 〈世界霸權與軍國主義〉(2:4) 〈論經濟的國權主義〉(2:6) 〈國家權力的界限〉(4:5) 〈國民經濟論與戰爭〉(4:11) 〈4:12〉 〈權力欲與民主政治〉(6:4) 〈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6:12)(7:1) 〈從經濟平等說起〉(7:8) 〈論信用政策〉(14:3)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綜上所述，《自由中國》對於主張民主自由的意見傳播，有其正面貢獻。由刊物編輯群與設定的讀者定位可知，《自由中國》具有相當的菁英性，其訴求的反共、自由、民主、團結議題，是由菁英來倡導、帶動、參與，故雜誌本身即為菁英間的對話²²。這種刻意形塑與維持的對話環境，使得《自由中國》既呈現了自由主義者對民主自由的意見；也反應自由民主與反共情境相互交疊的特殊情境。質言之，崇自由、尚民主、尊法治、重人權，這些是《自由中國》同仁追求的主要方向，《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之論述讓《自由中國》刊物在當時困頓的環境中迸發出光與熱，更為台灣黨外運動的歷史寫下關鍵性的一頁。

²² 顏淑芳亦持類似看法（顏淑芳，1989：95）。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